

后疫情时期学生负面情绪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浙沪主要高中和大学的调查

孔 确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 上海 201206

摘 要: 从2019年年末至2022年1月,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超过两年, 在关于疫情发生之初对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已有很多学者研究, 但是在后疫情时期, 疫情防控成为常态造成的影响却很少有学者深入分析。本文以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网络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为变量构建计量模型, 研究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负面情绪状况。结论认为, 父母的学历以及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并不会对学生情绪产生很大影响, 月收入在中等水平家庭的学生的负面情绪较严重; 学校的防控政策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负面情绪; 网络对疫情的负面报道较大影响学生的情绪状况; 学生的负面情绪不会受到学历或性别的影响。

关键词: 后疫情时期; 学生; 负面情绪; 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st-epidemic Period

— Based on the survey of major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Kong que

Shanghai Pinghe Bilingual School Shanghai 201206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2019 to January 2022, novel coronavirus has been prevalent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but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few scholars have deep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is paper takes family factors, school factors, network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as variables to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study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It is concluded that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emphasis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will no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students' emotions,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students with a middle monthly income are more serious. The school'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have increased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to varying degrees. Negative reports on the network epidemic greatly affect students' emotional states.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r gender.

Keywords: post-epidemic period,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empirical research

一、引言

2019年末和2020年初,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超过2年。疫情爆发以来, 我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对疫情防控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国外一些国家防控不力, 使得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至今还未结束。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一方面对民众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容易产生负面

的情感体验, 特别是学生, 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 由于学校严厉的防控政策, 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情绪, 影响了学习和生活。作者认为, 深入调查学生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有利于缓解学生的负面情感, 有利于学校的科学管理。

因此,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有关学生负面情绪来源的因素, 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对数据进行分析。

在第二部分,作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接着选取研究变量并构建模型,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且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回顾

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学者对于网民的负面情绪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包括突发事件对网民情绪的影响,以及网民情绪的识别,不同信息传播载体的影响,网民情绪影响因素。刘娜(2020)认为面对疫情,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网民的社会心态呈多样化,复杂化特征,需统筹媒体价值引领能力,夯实社会心理分层疏导能力。白淑英,王丽敏(2021)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新冠疫情初期网民负面情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突发事件中个人,社会及媒体均会对网民负面情绪产生影响,需要进行引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刘洪浩、刘忠宝等(2021)研究认为不同的信息载体如微博在疫情信息发布和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网民情绪产生影响。孙漫沁等(2020)收集2019年1月28日至2月4日3111份网络问卷,建立横截面数据模型,分析疫情早期人们的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程度、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疫情关注频率、信息负面程度、信息不实程度是其影响因素。

也有学者研究新冠疫情对于青年学生的负面情绪的影响,青年网民作为新时代网络社会构成的主体,应当在重大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部分青年网民与现实生活脱离,在重大疫情信息传播中缺位,其情绪也会受到影响(王春林,2021)。李鸥,王秋芳(2021)研究认为,家庭方面的因素对学生情绪会长生影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帮助高职学生进行情绪管理。刘阳等(2020)与马忠强等(2021)提出不同体育运动可以调节学生的负面情绪。叶艺等(2021)认为高校学生对新冠肺炎的风险认知水平较高,易产生负性情绪因此,应建立突发事件相关危机心理干预机制,缓解负性情绪,促进学生心理健康。陈功等(2020)研究了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返校后的焦虑情绪及影响因素,得出对学校封闭管理的不适应,不参与线上文体活动等原因加重了学生的焦虑情绪。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新冠疫情初期给网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然而,新冠疫情已持续将近两年。目前半开放的状态下,网民的负面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更多学者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另外,现有文献基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很少有学者对网民负面情绪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探讨。因此,作者设计调查

问卷对高中及大学生网民情绪及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设置,并根据结果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了解当前青年学生在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下,学校政策不断严格的情况下的情绪状况以及影响因素。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首先是因变量的选取: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当前阶段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焦虑情绪状况,作者在李克特量表法(Likert scale)的基础上,对学生的焦虑情绪采用7分打分法衡量学生焦虑情绪的程度,数值越大表示学生越焦虑。

其次是自变量的选取:本文自变量分为三个部分。家庭层面主要选取父母学历,家庭收入,以及家庭对疫情的重视度,其中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将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衡量并进行对比研究,分别用Fedu, Medu, 和Income来表示:其中父母的学历以大专及以下为基组,本科及以上(Feduh&Meduh)进入模型;家庭收入(Income)以below 5000为基组,Income5-10, Income10-20, Income20+分别进入模型。家庭对疫情的重视程度(Awareness)在李克特量表法的基础上,采用7分打分法来衡量,数字越大,表示越重视;学校层面主要选取与学校管理相关的变量,包括学校出省报备政策(REPREC),学校核酸检测制度(DETREC),学校封闭管理制度(CLOSEREC),作者主要采用被调查者对学校政策认同度来衡量,同样也采用7分打分法,数字越大,表示对政策越认同;最后,作者认为社会网络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负面情绪,采用7分打分法,衡量社会网络环境对负面情绪的影响程度,用INTERREL来表示。由于调研的个体所处社会角色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利益考虑以及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认知存在差异,同时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网络环境也会影响网民社会心态的变化,因为没有把办法直接对这些因素的负面效应做出假设,需要通过实证方法进行检验。为了区分被调查者性别和学历对负面情绪的影响,本文将性别和学历加入模型,其中性别变量以male为基组,female进入模型,学历变量主要区分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情况,以高中生为基组,大学生(Edu)进入模型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构建影响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负面情绪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

$$anxiety = \beta_0 + \beta_k x_k + \gamma_j d_j + \mu \quad (1)$$

其中anxiety是因变量,表示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负面情绪状况; β_0 表示截距项; x_k 表示本文中的自变量(不包括虚拟变量),包括学校封校政策,学校核酸检测政策,网络信息可信度,学校报备政策; β_k 表示这些自变量的系数,反映了这些变量对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负面情绪状况的影响程度; d_j 表示模型中的虚拟变量,包括家庭收入,被调研者性别,父母收入,受教育程度; γ_j 表示虚拟变量的系数,表示进入模型的类别与基组相比的情况; μ 表示误差项,代表影响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负面情绪状况的其他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 模型估计结果展示

作者利用问卷星平台收集到311份问卷,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利用Eviews软件进行估计,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STEPLS)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估计结果

Variables	LS方法结果		STEPLS结果	
	Coefficient	P-value	Coefficient	P-value
AWARENESS	0.079927	0.2115	/	/
CLOSEREC	0.183601	0.0027	0.193326	0.0013
DETREC	0.150366	0.0180	0.169057	0.0057
EUDCATION	-0.074648	0.6040	/	/
FEDUH	0.163497	0.2431	/	/
FEMALE	-0.082638	0.5557	/	/
INCOME 10-20	0.350438	0.0917	/	/
INCOME 20	0.208390	0.3610	/	/
INCOME 5-10	0.451840	0.0127	0.275972	0.0542
INTERREL	0.242352	0.0001	0.274707	0.0000
MEDUH	-0.011068	0.9376	/	/
REPREC	0.211078	0.0006	0.226650	0.0001
R-squared	0.595125		0.585641	
F-sta (prob)	36.5025 (0.0000)		86.2155 (0.0000)	
Dwstat	1.853006		1.842944	

根据表1结果,直接使用LS方法进行回归时,有6个变量不显著,但是经验表明,其中有变量对负面情绪有一定程度影响,因此作者怀疑模型存在多重贡献性;用STEPLS方法进行修正后,去除了不显著变量,余下5个变量显著性均有所增强。

(二) 相关检验

首先,本文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全部变量进入模型时,R-squared的数值达到0.5951,STEPLS方法估计时,R-squared的数值达到0.5856,表明拟合优度达到平均值

以上,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拟合优度检验。

其次,本文进行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检验包括T检验(用来检验单变量的显著性)和F检验(用来检验多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表1结果显示用STEPLS方法进行修正后,CLOSEREC,DETREC,INTERREL,REPREC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INCOME_5_1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通过T检验。根据表1,两种估计方法显示的F对应的P-value均小于1%,表明模型通过联合显著性检验。

最后,作者进行残差检验。STEPLS是消除多重共线性的有效方法,因此,STEPLS估计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的异方差,作者采用B-P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Obs*R-square为3.876573,Prob. Chi-Square为0.5673,表明接受同方差的假定,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对于模型的自相关性,因为样本数量n=311,自变量个数k=5,查表求的DW_L=1.57,DW_U=1.78,而表1结果显示,STEPLS方法估计后,模型的DW值为1.84,大于DW_U(1.78),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三) 模型结果分析

综上所述,STPELS估计的模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结果用公式2表示

$$anxiety=0.1691DETREC+0.1933CLOSEREC+0.2759INCOME5_10+0.2747INTERREL+0.2267REPREC+\mu \quad (2)$$

根据公式2,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认可指数(DETREC)每增加1个单位,负面情绪anxiety会增加0.1691个单位;学校封闭政策认可指数(CLOSEREC)每增加1个单位,负面情绪anxiety增加0.1933个单位;月收入在5000-10000的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的负面情绪更严重;网络环境曝光的新冠疫情严重程度对负面情绪有正向影响;学校出省报备政策认可指数(REPREC)每增加1个单位,负面情绪anxiety会增加0.2267个单位。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得,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就家庭因素而言,作者发现父母的学历以及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并不会对学生情绪产生很大影响。然而月收入在中等水平家庭的学生的负面情绪较严重,收入更高的家庭,学生的负面情绪并无显著变化。作者通过进一步访谈,得出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中父母的职业大多分布在生产销售,信息互联网,文化娱乐,餐饮服务等等,他们通常拥有买房买车,入籍所在大城市的理

想,而疫情的到来让各行各业的公司面临财务危机等问题,他们的收入也受到极大影响。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质量和家庭氛围也逐渐恶化,导致学生的心理焦虑越加严重。而更高收入的家庭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家庭中学生的的情绪不会产生波动。因此,作者建议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父母所在的公司(大多为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给予适当补贴,以一定程度上抵消疫情带来的冲击;而公司内部也应该给予员工更多工资补贴(包括临时性补贴和年终奖等)和人文关怀。同时,作者建议在父母应尽量克制由于疫情带来的情绪变化而传递给孩子的负面情绪。

其次,对于学校层面的影响,作者主要选取了学校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政策,作为研究影响学生负面情绪的变量。结论显示,不管是出省报备,核酸检测,还是封闭管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负面情绪。作者通过访谈发现,学生虽然认同学校应对措施,但是在执行期间,希望学校相关部门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方式,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分层管理,作者也建议学校部门能相信学生给学生多些谅解,对不同的学生多一些预案,尽量做到精准防控。

另外,作者研究发现网络对疫情的负面报道较大影响学生的情绪状况。主要原因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接触网络信息的途径较多,网络铺天盖地的疫情相关负面新闻让他们对疫情的结束持悲观态度,较大程度加重了他们的负面情绪。

最后,本文发现学生的负面情绪不会受到学历或性别的影响,也就是说高中生和大学生,男生和女生对疫情的态度与学校防控政策的认可,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别。

参考文献:

- [1]白淑英,王丽敏.突发事件中网民负面情感的影响因素及引导问题研究——以新冠疫情初期阶段为例[J].东南传播,2021(07):122-127.
- [2]王春林.重大疫情信息传播中“部分青年网民”的缺位风险及应对策略[J].理论研究,2020(04):75-80.
- [3]刘洪浩.基于深度学习的COVID-19疫情期间网民情绪分析[J].软件,2020,41(09):185-188.
- [4]刘娜.疫情冲击下网民社会心态差异及优化对策[J].人民论坛,2020(S1):138-139.
- [5]孙漫沁,李珊珊,岳虹好,李翔,李蔚,徐世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网民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0,22(03):686-691.
- [6]李鸥,王秋芳.原生家庭对疫情下高职学生情绪弹性的影响[J].通信与信息技术,2021(03):103-104.
- [7]马忠强,牟聪瑞,刘磊.新冠疫情封校期间不同体育运动对航海类学生负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高教学刊,2021,7(14):1-6+11.
- [8]叶艺,张洁,赵秋阁,范秀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学生风险认知、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21,35(02):74-77.
- [9]陈功,徐济达,卢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返校后焦虑情绪及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20,41(12):1851-1855.
- [10]刘阳,李雪宁,王协顺,杨宁,万炳军,史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运动干预对居家学生负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03):76-83.